

人物

采访记录里的罗哲文伯伯

□胡殷红



罗哲文，1924年生，四川宜宾人，中国古建筑学家，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40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1946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及建筑系工作。1950年，先后任职于文化部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等，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2012年5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罗哲文伯伯去世了。翻开旧时的采访记录，怀念他，点一炷心香默默送他。记住他，和大家分享那段不该忘怀的谈话。

199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0年。在日本，人们再次提起中国的梁思成、罗哲文二位先生，他们被称为“京都、奈良的恩人”。“梁、罗使日本古都免遭炸弹毁灭”的秘闻又成为了媒体挖掘的“新闻”。

记得那年我的舅舅正在联系罗哲文先生，准备再为他编辑一部书。闲时他谈到保护日本古都的话题。我提出请他联系，想采访罗伯伯，舅舅和他商量好时间，我便赶到他的住宅。

温文儒雅的罗伯伯是著名的古建筑专家，他曾到世界各地学习考察，那天他穿着大约是经历了若干夏天的白色圆领大背心，打开门，绕过书堆，又坐进书堆，毫无大师之态。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轻轻弱弱，若不是看着他那张笑脸，全可当他只是点头示意而已。他家那间客厅兼书房且兼工作室，没有任何现代化陈设，触目所见，到处是书。书橱“爆满”，从地上堆起的书刊资料一摞一摞高低不等，像一座座沙丘，如果不做片刻搜寻，全可当他是坐在书桌旁一尊微笑的雕像。我望着墙上挂着的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听他讲述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罗伯伯从1940年考入当时我国惟一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师从著名古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说起。

采访前我做了功课，知道中国营造学社是当时中国惟一研究古建筑的机构，梁思成是负责人之一。我不能白费了工夫，抢先说：“当时营造学社刚搬到宜宾不久，向社会招考年轻人做练习生，您当时十六七岁，刚高中毕业，又爱好绘画，于是去应考，没想到在众多的考生中，仅录取了您一个。1944年的七八月间，您刚满20岁，受命到重庆帮助梁思成工作了一段时间。您这个生在宜宾、长在宜宾的学生随恩师乘小火车顺流800里到了陪都重庆。”罗伯伯说，“是啊，从此我便一直跟随梁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然后，他突然声音大起来说，“你来采访，我们非常欣慰。我本人没什么可写的，如果你们年轻人多关心些古建筑是好事，我希望通过你们的呼吁，对我国古建筑的保护起到些推动的作用。”

聊天刚开头，我忽然想起进门买的两盒冰激凌还在礼包里，旋即拿出，罗伯伯不吃，边看着我稀稀落落喝冰激凌水边说：“那天天气也这么热，梁先生叫我跟他到重庆去办一件事。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重庆是大地方，又是战时‘首都’，我还从来没见过哩！记得那天梁先生也请我吃了冰激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这种洋玩意儿，觉得味道好极了，回味起来，现在任何一种高级冰激凌都不能与之相比。”我反复劝他，您尝尝这个化成水的味道。他不

太情愿地在杯口处抿了一下说，“再好也和心里记着的滋味不同啦。”

我的采访本里是这样记录当时情景的：往事就像他年轻时爱吃的重庆怪味豆，麻中有辣，又带着些许回味的甘甜。我问到了保护日本古都的话题。罗伯伯从头讲起：“那年，我和梁先生到了重庆，就住在小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幢楼里，每人一个房间。我被安排在另一幢三层楼的三层单间小屋内工作。小屋窗户小，光线不太好，白天有时也得开灯工作，梁先生不在那里办公。中央研究院的院长、秘书长在楼下办公。当时梁先生在美国留学时的一些朋友和他来往密切，进进出出神情严肃。梁先生嘱咐我不要常出去。我在那里一个多月，梁先生每天给我一部分军用地图，让我将他事先在地图上用铅笔标出的记号用绘图仪器绘成正规的地图。当时画出的蓝图，比例为50000:1。梁先生用铅笔将应予以保护的地方一个一个标出。我用鸭嘴笔、三角板、黑色绘图墨水再描清楚。主要用‘○’和‘□’两种‘免炸’符号，但是‘免炸’的大小范围的是不一样的。”

“那些日子，梁先生整天忧心忡忡。我们整整干了一个多月，有时晚上还得加班。标过的地图中有中国的沦陷区，也包括日本等太平洋战区之内的重要历史名城和文物古迹所在地，有的是整座城市标下来，有的是几个具体地点。那时我理解不了先生的良苦用心，更不懂得他苦心忧虑为了什么，只知道那些大比例尺的图一定是有特殊用处的军用地图。按照先生的要求，我在一张日本地图上标出了奈良和京都两座古城。因为我从中国营造学社以前出版的《营造学社会刊》上，曾经看到过介绍奈良、京都两座著名古都的文章，所以印象很深。记得当时这两座古都都是全部标出的。”

当年日本人也认定奈良、京都必炸无疑，做了最坏的打算。甚至将京都御所的整个木长廊都拆了。与奈良、京都相隔不过数十公里的大孤几乎被炸成废墟，而奈良、京都除投下一部分燃烧弹外，始终未遭到真正的空袭。遍布于这两座古城中的宫殿、古寺、古塔等建筑完好无损。“免炸”的效果十分明显。

“只是当时梁先生不与我一起办公，接触什么人我不知道。打电话又都用英语，我也从不打听。”

我想，年轻的罗先生深夜伏案标注那张日本地图时，一定不会想到正是自己描摹的线条，才使奈良和京都两座历史名城免遭人类战争炮火的毁灭。

事过几十年，梁先生已作古，罗伯伯很少谈起。可是，战后的日本人民却在苦苦寻找着“古都恩人”。198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教授在日本讲学期间，日本的一些历史学家谈起关于二战

期间日本许多城市遭到美军轰炸，惟独奈良、京都幸免遇难。大批文物得以保存的谜题。宿白先生想起他亲耳聆听过的一番谈话，作了这样一个提示：新中国建立之前，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著名古建筑专家的梁思成，在与北京大学教师的谈话中曾提到为保护日本的古都，向美军指挥部提出“免炸”的建议。日本人那时才恍然大悟，京都、奈良的“保护神”恰恰出自他们曾经侵略过的中国。

1985年，罗伯伯访问日本奈良时，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了宿白先生的提示，证实了梁先生的这个主张，证实了保住日本古都秘密的一半。

记得当时我曾问过，梁先生如何向美军指挥部建议，与谁联络？梁先生从何处取来军用地图，标出后又交给谁，美军如何使用等等。罗伯伯淡然一笑，“如今梁先生已作古，他带走了秘密的另一半！”

梁思成先生是梁启超的长子。“戊戌变法”后，梁启超逃往日本。1901年，梁思成在东京出生，直到10岁才返回祖国。梁思成读小学时曾随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一佛寺重建大殿，父母给了他一元钱，他用这钱在大殿的一片瓦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

半个世纪过去了，梁先生童年的绵绵心意同那片瓦一样留在日本。遗憾的是，他没能看到中日邦交的恢复，更没能重游扶桑去寻觅他那童年的往事，去看着他80多年前献上的一块瓦。

“梁先生在世时为什么从未提起标绘地图保护日本古都的事？”罗伯伯说：“上世纪60年代，中日、中美关系微妙，他不便说出与美军的这种合作……从另一个角度看，梁先生素来谦恭，从不自夸，他不会声张这种事，他认为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是自己的责任。”

罗伯伯的话想必我这个年龄的人都能理解，在梁先生故去之前的日子里，这件事只要说出，“特嫌”、“汉奸”之名恐难避之。我的记录里出现大大的两个字：沉默。

接下来说：“您绘的那些军事地图还有资料吗？”罗伯伯摇摇头：“关于这项建议的文字材料和图纸在何处，可能会成为千古之谜。”

“寺庙向江春寂寂，古碑无言草芊芊。”1972年梁先生永远带走了这个秘密的另一半，但奈良古寺有一片刻有梁先生名字的寺瓦至今保留，那是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深情厚谊的一个缩影，是梁先生保护日本古都功绩的一座孤独无言的丰碑。如今，罗伯伯也带着那一半未解之谜的遗憾走了。但日本人民的子孙后代，中国人民的子孙后代，都应该记住梁思成和罗哲文先生。

是为纪念。

□张行健

在高塬与大河之间行走

——记青年国画家张常亮

一面宽阔突兀的前额，额下有两只潭水一般乌黑的眼睛，两眼潭水仿佛被墨汁染过。这似乎是一个印证，印证常亮一生必定和笔墨有缘。

幼年的他对各种自然图案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站在吉州绵延的山头上仰望苍天，团团浮云在他童稚的眼里变幻成各种图画，游龙奔马、雄狮猛虎，还有一群又一群他最熟悉不过的牛羊；冬日玻璃窗上冻结的冰花，在他的眼里是远处的山村和近处的房舍，是山坡上一株又一株繁茂苍劲的松柏，是小毛驴儿驮着小媳妇走娘家的真实写照，是他儿时生活中所触及和联想到的所有内涵。他能很快地把这一切画到一张白纸上，使抽象变为具象，使呆板变为生动。可以说在整个中学阶段里形象思维填充了张常亮的空间，他喜语文，爱历史，更把绘画当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一本本素描与写生记载了一个少年对乡村最朴素的情感，对山水最初的感受。这其实是他生活积累的开始，由此引发出对艺术积累的一种自觉。

正如事物有其二重性一样，形象思维的发达却严重遏制了他的逻辑思维，前者的张扬和后者的委顿显而易见并形成了反差，高校与他无缘。他人生的大幕一拉开，背景便是起伏延绵的大山和逶迤跌宕的大河，命运注定他将一直在高塬与大河之间执著地游走。这似乎又兆示了他艺术道路的某种不平坎坷。

聪明而敏锐的张常亮似乎早就料知了这一切，成熟之后的他将昔日的许多经历和心灵磨难升华为难得可贵的生活体验和生命领悟。年轻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代名词，不安分的岁月一旦过去，人们需要的是沉静与踏实。张常亮踏上了一条沉静甚或沉寂、踏实与执著的从艺之路。

本土山水是常亮取之不尽、用之不歇的生活素材，雄性大山和母亲之河是他情感的依托和永远抒写对象。读常亮的山水画作，总给人一种凝重、质朴、稳健和空灵

的感觉。在绘画上他有独到的敏感，对本土山水那一份浓郁且深沉的关注和激情。才能与激情是可贵的，是从艺者不可或缺的潜质。张常亮并不仅仅靠这两个先决条件创作，七分采风三分绘画似乎是贯穿始终的从艺之道。每隔一段时日见到常亮的时候，那一张脸上总是有一层被太阳的紫外线格外关照过的光亮的黝黑，黑里透露着浓浓的红红亮亮的喜气。人祖山上的风，拂过这张脸，吉州塬上的雨，淋过突兀的额，南塬北塬有他踩踏过的足印，前川后川有他兜落过的风尘。一对会说话的黑黑亮亮的眼睛里，辐射着对那苍劲而开阔高塬的钟爱和高塬赋予它的灵性与收获。每每这时，常亮会拿出他厚厚的写生本，那是大山的沉甸甸的馈赠和母亲河的慷慨给予。常亮欢快而流畅的笔下，描绘了古老高塬的新姿，大河与小溪的激越人心的激荡，那片土地上生活的碎片，打麦场上的桔槔，牧羊人脑袋上的毛巾，老黄牛脖颈上的铃铛，还有山村、老屋、树木、窑洞、农舍傍晚升起的炊烟；另一角度的黄河落日，雪景下的土塬夜晚，隐在云中神秘的下弦月……

这一切都带着鲜活的生活原生态和最质朴最真切的气韵在纸张上滚动，在画卷上流淌。从这一张张一本本写生速写或素描中可看出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厚重的故土文化的深厚情节。凝重阔大的高塬和大山里清纯的水土给他以生命的滋养，他则要以赤子情怀和毕生心血给故土以回报。他作品的精神与形式，都与故土息息相关。

才能，能使一个年轻人空灵；生活，能使一个年轻人丰厚。生活的丰富和人生阅历的沧桑能使人体验深刻、领悟老到。

有聪敏、有悟性，再加上勤奋和执著，对生活的孜孜探求和不停顿的积累，常亮应该画出大气的上乘之作。壶口瀑布无数次激发着他的创作冲动。对母亲河，对壮观的壶口他有着得天独厚的创作条件，黄河的浪涛时时激越着他，走近母亲河，思考母亲河，感悟母亲河，读河想河，无数次地和大河默默

□王世尧

人间贵书香



一首诗可以让人入慈航，一本诗集可以让人忘情生死。痴迷收藏旧诗集，也缘于多年对诗的锲而不舍。1973年我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入列草明挂职创办的工人文学创作组，在王府井新华书店邂逅了平生第一次所购的两部诗集，《风展红旗》《阳光灿烂照征途》。此后几年，每见新诗出版，一般都不肯舍去。灯市东口有个中国书店，每每闲暇便去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集。《甘蔗林——青纱帐》《春满天涯》《天山牧歌》《在北方》《琴泉》《红柳集》《螺号》《山泉集》《回声集》《重返杨柳村》等尽数请回。我最终有幸拼齐一套1957年创刊至1964年终刊的《诗刊》，为这套书牺牲了150余元，相当我4个月工资，这些书在当时弥足珍贵，不离不弃地与我的激情和灵魂相伴。

我工作在高温铸造车间，每日咸汗洗身，因为爱诗，苦可以转化为浪漫良知。我醒悟，在艰难中善于发现美就能感受快乐，冲天炉前一旦铁水飞泻，火花四溅中紫霞缤纷，待天车驶过，一弯炫目的彩虹跃然眼前，转瞬便呈现挥舞钢钎的奔忙身影，那场面极富诗意。结束疲惫不堪的一天，晚上回家最大的期待就是读书。车间工具库有很多用于造型铸造的旧报纸，我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副刊剪下的诗歌贴在过期的《红旗》杂志上，自制诗集数十本之多。我的堂姐见我如此用心，带我去她住东单三条的邻居柳倩。柳倩曾是“左联”著名诗人，也是书法家。那时他从干校回来赋闲在家，不仅教我欣赏诗歌，还送我一些老板诗集。我与藏书似乎有缘，当时我业余发烧意大利美声唱法，我的老师陈德义毕业于米兰音乐学院、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1975年落实政策后把退还的书堆满了我那不足10平米的小屋，我一夜暴富，他最后留给我的除老板诗词外，还有大量的相学书籍，包括少许线装古书。

1978年，我每天都卷入王府井新华书店庞大的购书潮。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的重新再版，让我感到一个新时代汹涌而至。书店门前还形成前所未有的“换书”群体，拿旧书换新版名著，用新版名著换旧版书，我属前者，我如饥似渴地置换着，乐此不疲。那时的我无比单纯，看着琳琅满目的新书感觉把旧书换掉仿佛甩去包袱。多年之后我自叹这个错误如此低级。1986年我调中国作协担任草明专职助手，1990年调作协创联部。现实与内心更广阔的世界豁然开启，我与臧克家、艾青、冰心、贺敬之、柯岩、朱子奇、严辰、公刘、胡绍、高洪波、刘小放等中国诗坛巨匠和著名诗人不仅有了近距离接触，必然珍藏他们赠送的著作。我和臧克家小女儿苏伊曾同在秘书组，常到东堂子15号做客，臧老和夫人郑曼为人慈祥友善，我荣幸收获了臧老赠签的六卷《臧克家文集》和诗歌散文集，臧老和艾青、冰心老人一样为我写下书法留念。我最大的乐趣是帮助高洪波整理书籍，他为人慷慨大度，善于纵墨豪饮。他每出版新诗集或其他著作都不忘送我。他的收藏精良丰富，我常向他索取诗集之类的书，十多年前帮他整理书后获《1956年诗选》，我对这部没有封面的书爱不释手，并引发对那个远年代诗人的纯真震撼。岁月如水，我对诗歌的追随延续着对诗集收藏的热衷，新时期中国的诗歌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历史性繁华。但中国文坛几经价值演变，而今文学艺术的边缘化，让纸媒时代的诗歌彻底大众化、普及化。最直接的体现是新诗的自我强大和新诗的无限自然化，这一切造就的深奥，读来比伟大先人留下的古体诗词更难诠释。于是我怀念我所封存着历史之美的诗集，如同怀念一个时代的纯粹。我寻遍有可能卖旧书的地方，意图重新拥有对诗的那份童真。那些日子我几乎隔天就要向远在石家庄的刘小放去，他是新时期现实主义诗歌杰出的代表之一，公刘定义他的诗集《大地之子》是中国农业的《离骚》。小放体现了北方男人一贯的侠义豪爽，先后寄赠数十本珍藏已久的老板诗集，我的期待再度延伸。冯敏多年前就告诫我：这个时代不懂电脑就没有现代人身份。我扫盲后最大的成就是通过网络让当年失落的诗集全部回归。意外的是我收全了两套1957年创刊至1964年终刊的《诗刊》。收藏旧诗集另有惊喜，《伐木声声》《白杨颂》竟是李玲大姐上世纪60年代的藏书，通话后得知她曾想把大部分藏书捐给故乡未能如愿，一小部分被孩子无意当废品卖给书商。

我不属懂诗的人，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只读懂《诗歌的荣光》《大地之子》《山雀子衔来的江南》《挽留——方向诗选》等为数不多的几部诗集。爱诗如同独立岁月激流守望太阳的红帆，年过50已望尽人生归路。读诗似乎可让生命之树的翠叶能够挽留青春，而搏动血脉，植绿心境正是我的收藏。冯牧曾写给我：“斯文在天地，人间贵书香”的诗性箴言，我把它装裱后珍存，语义至今铭心。我也许固执、也许未能彻底妥协、未能彻底妥协的我把方向的诗集永远放在枕边，用以怀想千岛湖从不褪色的春天，体味他用身体与生命写诗的虔诚，感念他笔下金黄似海的油菜花，仰慕他以落日辉煌倾泻的心灵深度。

收藏

丁东亮书画作品集·生津不水秋高天



天高秋水不染尘 张常亮 作

地交流和对话，以获得艺术灵感和创作激情。他用心去记，用心去揣摩，常常以最简洁、最明了的手段勾画曾深深触动他的大河的雄姿、气势，大河的状态、大河的精致和大河的魂魄。《苍穹欲雨洪涛生烟》是素慕壶口的大气磅礴之作，黄河的浪涛在这里一落千丈顿生云烟，其逼人摄入的气势毕显于画卷之中，令人喟叹不已；另一幅姊妹卷《壶口水激四时雨山鸣谷终日雷》与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他选取了另一个视角，从这一视角表现出的雄伟瀑布和大瀑布的气势更惊、更险，令人叫绝。同一类作品还有《黄河滚滚势不绝》《坦荡东流去》等。可看出常亮对“大题材”有一定的驾驭能力，这类作品的共同特点是雄伟有力，错落有致，奔放跌宕，浑然一体。这表现了常亮的气质，也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他的心胸和心智。

艺苑